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乱世英烈】	纪念在新中国的铁屋子里面勇敢呐喊的“狂人们”	宋永毅
【来龙去脉】	从“大有作为”到“很有必要”	秦 晖
【追根溯源】	中国暴民政治的历史渊源	许成钢
【亡灵祭坛】	被镇压的父子：邓鸿芹、邓思京	孙 陇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乱世英烈】

纪念在新中国的铁屋子里面勇敢呐喊的“狂人们”
——《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电子版序

• 宋永毅 •

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并千方百计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一次，钱玄同兴冲冲来到他留日时的朋友周树人的住处来动员他写启蒙大众的文章。当时周树人正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的极端苦闷之中。钱玄同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这句话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他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一名旧礼教铁屋子里的最勇敢的呐喊“狂人”。

和鲁迅一样，在这本近五十万字的文革异议者文献里的近七十名名作者和先驱者，也是在中国铁屋子里勇敢呐喊的“狂人”。和鲁迅不同的是：他们大都是小人物，生前非但没有鲁迅作为一代文豪的赫赫名声，甚至还因为是思想超前而的“狂人”而深陷众叛亲离的困境（如顾准晚年）。然而，“新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的铁屋子，要比旧礼教的铁屋子何止黑暗和残忍成百上千倍。鲁迅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万字的针砭时弊的文字，但是他从没有因此而遭受到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的通缉、监禁和杀戮。而文革中的异议者们，仅因为在书信、日记、甚至在“向党交心会”上的直白（如张志新）或写给男/女朋友的情书（如李九莲和王申酉）就导致杀身之祸。即便是被执行死刑，这些异议者的遭遇在中国数千年的执法史上也是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千年的皇权体制下，死刑犯在临刑前被游街，但衙役们从不阻止“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之类的阿Q式的口号，以尊重死者生命的最后宣

泄。而张志新、李九莲、陆兰秀等人在执行死刑均被先割断喉管，或用竹签把下颚和舌头刺穿成一体，或被脱去下颌，口中塞满布条，以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更有甚者，和李九莲同案的女反革命犯钟海源在临刑前还被政府残暴地“活体取肾”，去为一名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延续生命。因为鲁迅从未经历牢狱之灾，我们无法也不应冒然揣测他如何直面死亡。但是本书中绝大多数的异议者，都表现出了重信仰轻生死的大义凛然。这里仅举两例以示之：

其一，是1940年入党的中共女干部陆兰秀、原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被杀害前四天的最后审讯纪录中的一段，时间是1970年6月30日下午。

问：你为什么要文化大革命快点结束？

陆：因为反面教育太多了，大家不能理解。文革已经4年多，可以结束了。

问：你写要求，党中央“放下屠刀”是什么意思？

陆：我写的是向真理投降的意思。我死而无怨。人总有一死。（2）

其二，是关于湘西妹子丁祖晓因散发反对毛的个人崇拜的传单而被杀前的一段记述：

1970年5月3日，在复核材料的最后一场审讯中，经过10个月关押的丁祖晓，脸色有些苍白，但依旧显得十分庄重。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抓住这个机会，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5月5日，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问道：“丁祖晓，听清楚没有？”她坚毅地高声回答：“听清了！”然后返身进入牢房，坚决拒绝了在回执上签名按手印。

5月8日，无产阶级的子弹，射杀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好女儿丁祖晓。同一天，她的同学李启顺也遭到枪杀，她的姐姐丁祖霞被判刑20年，17岁的李启才判刑10年。（3）

五四以来，鲁迅等人就一直致力于对中华民族“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国人的麻木、自私、冷漠、犬儒等等负面的特征得到了深入地揭露，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正是国民性的化身。不幸的是，这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知识分子群痛彻心扉的探讨对今天的中国人的国民性还是适用的。但是，这些探讨也忽略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中国人中不仅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而不惜杀生成仁之士，在文革这样的最黑暗年代，也还有成百上千的异议者，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铁屋子里发出勇敢的呐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奉献、理性不正是自鲁迅以降的前辈们孜孜以求的完美的国民性吗？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国人缺乏这些宝贵的品格，而是在于这些美好的品格没有机会发扬光大。当这些异议者们被当权者最迅速和残忍地杀害，死后还要不惜代价地掩盖他们的声音和思想时，自然就使他们无法起到力量无穷的榜样的“正能量”作用。改造国民性的过程如逆水行舟，既然缺乏灯塔和动力指引和推动国民性的改造，我们整个民族当然只能沉浸濡于铁屋子里的堕落和昏睡之中了。而本书的目的之一，也正是要重新点燃这些先驱者以生命铸成的灯塔，有助于唤醒至今还在“新中国”的铁屋子里昏睡的民族。

文革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想先驱者当然绝不止收入本书中的几十位。文革结束后，公安部直属的群众出版社出版过《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1979年），《党和人民的好儿女》（1979年）和《划破夜幕的陨星》（1981年）等书，就报道了78位在文革中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奋起反抗的先驱，其中20人被迫害致死。但或限于篇幅，或因为原始报导过于简单，使我们无法全部收入。在此也作一遗憾的说明。

◇ 异端思潮和公民异议的异同

顾名思义，“思潮”就是一种群体性的流行行为，而“异议”则可能是个体性的。

1996年8月，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一文中提出“异端思潮”的概念时，曾把它们定位为：1）它们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2）“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最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流行程度上更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4〕换言之，异端思潮无论在其发端和湮灭时都均有一时一定的公开性和群众性。作者不少还是文革中合法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如北京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或思想家和代言人（如湖南省无联的杨曦光、湖北决派的鲁礼安和清华四一四的周泉缨等人）。不同于流行一时的异端思潮，本书中的异议文献，更多的是表现了作者思想的个体性和隐蔽性。

这两种文献的表现形式上也常常泾渭分明。前者常常取公开的大字报和传单的形式，而后者却常常是取匿名的传单、信件甚至口号标语的形式。其他的一些公民异议的形式，如上书、日记、私人通讯和狱中手稿等也更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的性质。

公民异议采用上述形式，当然主要是由它们在思想程度上的尖锐性所决定的。如果说遇罗克的《出身论》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恢复中共的“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因而还可以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追求出身问题上的平等和人权，那么刘文辉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恐怕只能走散发匿名传单的反抗之路。例如，刘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批驳了中共的整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体系：

第五条：坚决反对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人民，执政后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毛泽东这位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5〕

刘文辉的匿名传单写于1966年9月，当时文革的纲领《十六条》刚刚颁布一个月，全中国90%以上的“人民”对文革还是衷心拥护的。而刘文辉不仅公开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还同时站在了几乎全中国人的对立面，实为众醉独醒。如此超前的思想和先知，是绝对无法如遇罗克等人那样，先组织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公开地办一份《中学文革报》来发行宣传的他反毛和整个文革思想体系的石破天惊的主张的。如果不采取匿名传单的形式来自我保护，即便不被公安机关逮捕杀害，也极可能在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的群体暴力中丧生。

在异端思潮的流行中，很少有直接批评指责毛泽东的文献。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思想局限，二是直接违犯文革的“法律”。三是即便有人意识到毛的错误，直接批评便无法取得思潮流行的群体性。1967年1月13日，中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中已经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样，也迫使异议者

们常常采取匿名信的形式来直接批评，哪怕这些批评完全处于善良的动机。比如，原新疆哈密铁路分局水电段经济计划员忻元华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错误，不能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决然上书毛泽东。从1967年2月至6月，他先后给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和全国48家报刊，投寄了9封匿名信。他在信中写道：

难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诞生而仅仅是您一个人自己的天才创造吗？难道您的光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只用于改造别人，而不适用于改造和约束自己吗？……难道你真的自信到连自己周围的最亲密的战友们也不堪信任了吗？难道您真的忘记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伟大的真理吗？

尽管忻元华的信中充满了赤子之心的善意，他却还是被逮捕了。1970年5月30日上午，当局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忻元华最后的话是：“我给毛主席写信提意见是正确的，你们认为我是现行反革命是错误的！谁是谁非，历史将会做出正确的结论！”之后，狱方立即把他绑赴公判大会，在大会上宣布：忻元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死不改悔，反动气焰嚣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就义时年仅37岁。（6）

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领袖的爱戴，不想把对毛的批评公开化。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公安六条》里规定“反革命匿名信”是犯法的，许多的异议者采取了写给毛泽东的私人的、但坦诚署名的“上书”的形式。这些信件无一不充满善意，完全符合毛自己一再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党群关系的民主原则。如收在本书中的傅世安两致毛泽东的万言书（1966年7月15日—1967年2月），王容芬上毛泽东书（1966年9月24日），胡全林关于林彪“顶峰论”、干部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问题三上毛泽东书（1966年11月—1970年12月26日），萧瑞怡上毛泽东书（1968年5—6月），王若水就批林是反“左”还是反右给毛泽东的信（1972年12月4日），朱锦多关于张春桥、江青等人问题两次上毛泽东书（1975年8月3日；1975年8月26日），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书毛主席的两封信（1975年8月13日；1975年10月13日）等都表达了对毛泽东纠正错误的极为善意的规劝和真诚的希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上书者的心中恐怕还多多少少存在着“好皇帝、坏奸臣”的思想局限。尽管如此，这种直接对最高领袖的批评的思想高度和直达天听的上书形式都还是异端思潮文献无法企及的。

和异端思潮相比，公民异议者的思考常常不仅更尖锐，还更深刻、更具有系统性。

其一，区别集中在对于中共的党内斗争的态度上。比如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案，异端思潮的作者很少有公开的反对，而公民异议者就有清醒得多的思考。在“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响彻全中国时，相当一批的公民异议者就公开地站出来，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构陷进行有理有据地驳斥。进入收入本书的，就有张志新、吴晓飞、朱守忠、贾正玉、陈寿图、李九莲、屠德雍、史云峰、王申酉等一串长长的名字。原为辽宁省委干部的张志新就是因为党内生活中提出对中央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不同意见而遭受牢狱之灾的。即便身陷囹圄，她也没有放弃对史实和真理的追求，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〇年一月张志新在沈阳管教所写下六篇“为刘少奇辩护”的文章，系统地驳斥了刚刚通过的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她在这些文章里写道：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科学的进化的，它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虑。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报告起草者，为什么要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加以歪曲，而且在已经断章取义的情况下，挖空心思地又在前而加上所欲加的形容词，从而得出预想的结论，欲加的罪名。按照马克思的教导，真理是由争论确定的，就不难得出应有的结论。……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两报一刊社论、九大《政治报告》都曾指出“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但至今尚未看到在各大历史关头中详细的较完全的材料（除已公开的有上述状态的材料外），作为想早日完全弄清党内这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普通共产党员来说，不能不感到遗憾和焦急不安。综上所述，作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罪状之一的妄图发展资本主义，是无根据的，指出的那些具体问题和毛主席的论述不相违背。因此，说它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无法成立。那么为什么要人为地列入和制造两条路线斗争，实属难解。（7）

这样有理论和史实双重基础的思考，还体现在年仅19岁的江西南昌的中学生吴晓飞的有关刘少奇问题的手稿中：

1968年初，他构想写一部全面论述刘少奇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的著作。他拟就了目次，全书共分14章，50多个小节。他毅然地把自己反锁在一间斗室之中，不分昼夜，伏案疾书。母亲前来送饭，他默默地领情；弟妹的打扰，他就会一反常态，双目怒睁，咆哮如雷。他从第一章开始，用15个小节写出十几个专题，分别标以《刘少奇的民主革命工运思想》、《白区斗争》、《（所谓）白区派》、《土地革命》、《刘少奇对民主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社问题》、《八大政治报告》、《经济困难的过渡》、《刘少奇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特点》、《教育思想》、《新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修养论》等小标题。他较为详尽地考据和引证了事实确凿的文件和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8）

其二，区别还反映在对文革后应当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体制的思考上。文革异端思潮所憧憬的新的国家体制，莫过于巴黎公社式的乌托邦政体。这是因为中共数十年的政治封锁，使国人除了一个马克思著作中提到的“巴黎公社”外，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理想政体。这一局限，在本书所收的陈尔晋的《特权论》里有了举足轻重的突破。陈尔晋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政体，要“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两党制，年度选举等办法，确是不要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国行之有效的办法。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其中难道没有无产阶级可吸取的合理成分吗？”因而“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第三个来源。”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提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两党制”——把共产党一分为二进行良性竞争，建立一种“法制、民主、分权、人权”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9）对此，中国学者印红标的评论颇有洞见：“尽管此时陈尔晋借鉴西方制度的思想尚有生硬嫁接的特点，但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思潮，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成春潮汹涌之势。陈尔晋的《特权论》成文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10）

当我们在指出异端思潮和公民异议者的区别时，还应当指出它们在反文革主流意识形态和反毛体制的相同之处。正是这一相同之处，才使它们都受到了毛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同程度的批判和镇压。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两者的关系，有时还能够发现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比如，原华东师大物理系学生王申酉曾是一名造反派红卫兵，参加了一九六七年初的“炮打张春桥”的异端思潮的活动。他看透了张春桥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取得政治骗子”。炮打失败以后，王申酉陷入了对文革政局的更大的失望，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深思：

这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是一致的。……毛在十年前划了五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这一次！

历史给人开了个玩笑，几十万的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街道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的）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班无赖、流氓小人则反而上了台，这是一个大大的玩笑，聪明人倒了霉，聪明人都倒了霉……

几十万大学生、几千万中学生，近万万小学生在虚度着光阴，更有几万万人在消极怠工，这一次起码逼死了几万条人命，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11）

正是这种鲁迅式的“绝望”，使他开始呕心沥血地学习马列原著，对文革和建国以来的毛路线进行系统的批判的精神长征，成为在异议者文献中理论水准最高的作者之一。“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最后却也因为王申酉的这一思想升华，给他在粉碎“四人帮”的上海带来了杀身之祸。

◇ 公民异议者自身的分类、比较和升华

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比较和分类，不应当仅是横向的、和其他种类的社会现象的比较，还应当是纵向和内向的，即和自身的社会现象和派别里中不同类型的“子现象”和“子派别”的比较和分类。对于文革中的思想先驱者，以往的研究比较偏重于他们异议思想的分类。比如，有研究者把他们的理论要点分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文化大革命”，“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五大类，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12）其实，除了我们熟悉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这些异议者们一些基本信息的比较和分类——诸如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身份、运动经历等——也常常会有助于研究者的视野别开洞天，挖掘出深藏的底蕴来。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妨取本书公民异议者中17位最后被杀害者的一些基本信息来做一点有趣的分析：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政治面目/	特殊政治运动经历
林昭	37岁（1932—1968）	大学	团员，调干生	57年右派；60年组织反革命集团
刘文辉	30岁（1937—1967）	中学	团员，工人	57年右派；66年3月因外逃被管制3年
忻元华	36岁（1934—1970）	中专	技术员	1965年因上书被管制3年
王笃良	27岁（1944—1971）	中学	党员，军人	
吴晓飞	21岁（1949—1970）	中学	群众	
朱守忠	50岁（1920—1970）	大学	党员，中学校长	57年右派，65年四清“地主分子”
陈寿图	57岁（1923—1970）	中学	党员、公社党委委员	
张志新	45岁（1930—1975）	大学	党员干部	
李九莲	31岁（1946—1977）	中学	团员，红卫兵头头	72年反林彪被捕；74—76年翻案和反华国锋被杀
丁祖晓	24岁（1946—1970）	中学	群众	
贾正玉	33岁（1937—1970）	大学	团员，小学教师	
陆兰秀	53岁（1918—1970）	大学	老干部，图书馆馆长	
蔡铁根	59岁（1911—1970）	大学	老红军，高级军官	1958年军中“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受害者。1959年被划为“右派”
徐关增	32岁（1938—1970）	中学	囚犯	60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无期；70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联盟”被杀

史云峰 / 27岁 (1949—1976) / 中学 / 工人
武文俊 / 40岁 (1937—1977) / 大专 / 中学教师
王申酉 / 33岁 (1945—1977) / 大学 / 留校监督劳动的学生 / 65年四清被定为“反动日记”，66年因此打成“反动学生”

平均值 / 平均37岁 / 近一半有大学文化程度 / 近一半人有生前被多次迫害的经历

如果我们从年龄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公民异议者，会发现这一37岁的“平均年龄”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其一，这说明他们对政权的异议完全不同于心血来潮的青少年。这一平均年龄，要比文革初期那些16—18岁的、被毛的一两段语录忽悠而创立了“红卫兵”的中学生们大了整整一倍。其二，还说明了他们的异议思想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孔子有言：

“三十而后立”、“四十而不惑”。这一平均年龄已经非常接近于一个成年人的“不惑”的阶段了。从这一角度，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公民异议者大都有“虽九死而不悔”的就义的慷慨。例如，上海青年工人刘文辉因散发公开批驳文革纲领《十六条》的匿名传单而被处于极刑，30岁的他在给家人的“遗书”的最后写下了这样的泣血段落：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13）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他们百分之一百是受过中学或以上程度教育的，甚至近一半接受过大学教育。这在今天的中国或许已经是见多不怪的事，但是在文革前还是很稀罕的。以接受过大学教育为例，当时的中国社会大约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在上述表格里，年龄37岁及以上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异议者有这样五人：林昭（人民大学），朱守忠（复旦大学），张志新（人民大学），陆兰秀（武汉大学）和蔡铁根（厦门大学）。他们至少在民国时期完成完整的中学教育，才进入大学。从他们就读的学校来看，又无一不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这至少说明他们感受到过较为民主宽松的民国的教育氛围，也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比如，陆兰秀有很强的外语能力，在大学期间就自学德语，研究《资本论》。1949年后，她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普图书馆副馆长。又自学了俄语，并阅读了大量社科人文书籍。所有这些对知识和理论的研读，才使她在文革开始不久就看出“毛泽东发动此次革命是错误的，是历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须马上结束他对党的控制。”（14）和陆兰秀等人留在共产党的体制内对毛和文革的斗争不同，林昭对毛和中共的认识早已经超越了中共的整个体制。如同《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中所写：

关押期间林昭……污蔑、漫无边际骂我党是“魔鬼政党”，“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制造者和崇拜者”，是“极其暴虐只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丧心病狂地漫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所谓“魔鬼”、“暴君”，“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等等。一再叫嚣只要“活一天，就要和毛泽东斗争一天”。……在她的报告、笔记中公开书写“美国万岁”，“自由万岁”，“联合国万岁”，“修正主义万岁”等反动口号……林昭自逮捕预审以来，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判决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五六判决是“极其肮脏，极其可耻”，还恬不知耻地以“自由战士”自居，对判决“感到无上光荣”，是她“战斗生涯的好见证”，咬牙切齿地污蔑我党和政府。（15）

在本书所收的林昭文革狱中的六篇文献里，有一篇是文革肇始时的“林昭上诉书致联合国”。她在里面写道：

我不知道我这上诉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联合国致达，但我凭着对于上帝公义和世人良知、对于人类社会文明政治道义的最为坚定的信念，确信它必定——早晚有一天能够！……我们，中国大陆青春代对于这个不义政权魔鬼政党的战斗正是世界自由人类保卫生活、保卫自由、保卫基本人权之总体战役的一个组成部份！也正是基由着这一点我要向联合国提出上诉！

我将怀抱着这一份公义必胜的信念坚持生活，或者怀抱着这一份信念舍生取义！

自由万岁！

美国万岁！

联合国和她所坚持捍卫的基本人权万岁！

林昭 主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十四日

从上述林昭的遗文中可以看到：林昭之所以能在黑牢里近十年如一日地反抗中共的酷刑和洗脑，是有着一整套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的。其一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认同。比如，中共自建国以后 20 多年才加入“联合国”，但是林昭却把它而不是“中共中央”作为她上诉的权威机构。这显然和她在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是联合国主要成员）接受的中学教育和大学里对西方文献的阅读息息相关。其二是对从小因家庭而得到的基督教文明的皈依。在林昭所有的狱中书信里，她已经全部运用“主历”来标记日期，以表示自己的虔诚。因此，在所有的公民异议者里，林昭是对毛和中共政权有最清醒认识的人之一。

最后，我们绝不当忽视了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中近一半的人在文革前就有过遭受政治迫害的特殊经历。比如，林昭、刘文辉、朱守忠、蔡铁根都曾是“右派分子”，王申酉在 1965 年的“四清运动”里，就因为“反动日记”问题被内定为反动学生，更有甚者，在本书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在 1970 年 3 月 8 日判决的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反革命暴乱集团”中的徐关增、王汝强等二十六人，竟都是监狱里的在押犯！他们中的十三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判决书，这十三人在文革前，尤其是大跃进一大饥荒岁月里都有过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科学共产主义”、“中国人民社会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国劳动党”等民间社团的“前科”。按这份判决书所言：

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二十六人。召开反革命会议三十四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一百七十九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张。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16）

撇开中共的法院文件一贯的无限上纲的措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所谓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其实是由一批同样信奉共产主义的青年政治犯组成的一个监狱中的读书组织。如果说这些青年政治犯在第一次组织的民间异议团体时还打着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

党”或“中国人民社会党”的旗号，那么，在文革中他们已经回归到正统的共产主义旗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形成了以反对毛泽东的法西斯的“元首主义”、“元首党”为主的系统的理论纲领。

常常有中国的政治犯感叹道：“迫害使人成熟”，“监狱是人生的大学校。”闻者虽然会觉得有点令人哭笑不得，言者却凿凿地揭示了公民异议者的思想升华过程。我们在林昭、刘文辉、王申酉等人的思想发展中都可以领略这一真谛。在一些受迫害的中共老干部身上有时也是适用的。比如，蔡铁根是个1936年的老红军，大校军官，也是中共在文革、甚至建国以来枪杀的最高阶的军人。蔡在1957年的军队内部“反教条主义”的派系斗争中因讲了一句就事论事的公道话被整，接着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被分配到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当巡视员。因为被迫害，使他看到了基层在大跃进一大饥荒中的惨状，并使他对整个所谓的“党内斗争”以及倡导人毛泽东都有了升华到理论的清醒认识，在他所记的日记中，有不少这样的段落：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17）

文革开始，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当时，抄出了蔡的40多本日记。因其中有不少批评毛泽东的话，蔡被立案审查，最后把他和一起议论时政的一些老干部一起打成“反革命集团”，常州市的公检法军管会在1970年枪杀了蔡铁根。

或许，老干部顾准的文革经历更能够形象地说明异议者在逆境中的理论升华。顾原是一个专业的财政人士。顾1935年加入中共，1946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因不同意运动式征税，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顾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因此被称为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1957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顾准当然是中共多次政治运动的极端受害者。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己的苦难中一次次地超越。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对象，为什么会妻离子

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而是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献，从理论上探讨“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换句话说，是一个为什么革命常常最后违背了革命者的初衷变为残酷的专制政权的问题。本书限于篇幅，只收了顾准的三篇遗文，但已经可以看到他对整个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的巨大贡献。

比如，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1973年4月20日）中，顾准批判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关于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的概念。顾准认同代议民主，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如果在广土民众的国家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再如，在《民主与“终极目的”》（1973年4月29日），顾准又指出：“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在本书所选的顾准的第三篇遗文《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1973年8月27日）中，他通过说古论今、博征旁引提出了对今天的中国社会都值得深思的命题：

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18）

顾准留下的思想遗产博大精深，当然不止于本书所收的三篇读书笔记。顾准的这些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性反思，更是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体制的终结性控诉，即便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散发出逼人的光芒。顾准在政治逆境中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笔记、通信的形式保留下来，在文革结束和他本人于1980年获得平反以后得以陆续出版：1982年，他的“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出版；1989年，他与弟弟陈敏之通信写下的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名发表；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1995年后出版的有关著作还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五十年来思想界第一人”的高度评价。

◇ 逍遥·读书·异议

以其反文化特征闻名于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常常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焚书坑儒”的比喻流传于文字记载之中。其实，这是一种并不全面的历史错觉。就其全过程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顺从与抗争，幻灭与追寻，疯狂与觉醒错综交织，相互转化的政治思想运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焚书”的结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人倍增的读书欲望；反文化的悖论是造就了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尤其是异质文化如饥似渴的汲取。与熟为人知的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相伴相随的，文革中的中国还有过一场不为人知的冷静的地下读书运动/活动。

引发这一读书运动/活动的原因之一是青年学生对日益疯狂的文革的失望，从最初的狂热中退隐成为“逍遥派”，并从书籍中寻找离经叛道的答案。本书所收的“王军胜日记选

编”就反映了这些原来普通的学生成为异议者的思想过程。另外，文革中的逍遥派的部分成员很可能本来就是这一动乱的反对者，即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整的所谓的“反动学生”。通过本书所收的“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对本校反动学生金伟仁的处分决定（1967年11月8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关于对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徐超汉的处分决定的批复（1968年1月26日）”，可以看到当时对这些“反动学生”的整肃。

应当指出：推动这一读书热潮的是1968年始的上山下乡运动。自1968年下半年起，一场当代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青年的下放/流放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至1978年底，大约1623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农场和基层，其中包括“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业生近460万人和“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近67·5万多人。（19）不管目下学界如何解释这场运动的最终动因，但曾被毛泽东器重与信赖的红卫兵此时已被划为应当接收改造的“知识分子”范畴和应当“接收再教育”的革命对象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此，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上山下乡”的发动都是毛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然而，事与愿违。这场运动使所有的青年学生的地位直降到水平线以下，从而使他们抛弃前嫌，消弭派性，成为异议者。本书中所收的“卢叔宁的日记和书信选编”就反映了这一过程。卢在文革中为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还曾是一份红卫兵小报的主编。因对文革有歧见而当了“逍遥派”。据他后来回忆：下乡以后，他“一面有意识地用超强度的劳动磨练自己……一面抓紧点滴时间读书。那时读书真是很苦很苦的……我的读书，目的性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对当世进行研判和剖析，并且把这一剖析记载下来，这便成了我日记的主旨。……我日思的起点是从对林彪的怀疑开始的、对他的目的、手段、阶段性战果及演变都作了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20）

本书中所收的知青读书运动的另一文献，是“对中国农业体制问题的一些思考——张木生在一次地下沙龙活动上的发言（1969年12月）”1968年秋，在内蒙古临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木生等人通过认真读书学习，写出了《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探讨》一文，并频频在知青中演说。文章和演说都大胆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公开反对“学大寨”，主张“三自一包”；并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这一读书笔记还曾得到当时闲居在家的胡耀邦的首肯，并在北京知青中刮起了一股“张木生旋风”。粉碎“四人帮”后，张木生被调到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成了新时期农业经济理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国内女学者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张木生自述在插队落户期间组织“读书会”学习的情景：“后来我回北京，其间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吉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传》、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22卷从头过了遍。同时，我还翻阅了1957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斯大林的黑幕，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七千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份量并不那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深。”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21）这里，“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等都是流行一时的油印地下读物。当这些红卫兵们自觉地把他们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时；他们完全用反“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这种自觉，正呈现出他们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过渡的精神轨迹。

在中国当代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另一个历史时期象文革中的青年人那样如此大规模地，如饥似渴，百折不挠地去找书，读书。任何禁令和风暴都无法阻隔他们对书的拥抱；书，在他们眼里不仅是精神食粮，而且是一种不惜用生命去偷盗的“天火”。由于文革中所有图书馆的被迫封闭，青年学生们为读书寻找真理而当“孔乙己”的事曾屡见不鲜，甚至横遭迫害的逆境都没有泯灭他们这一燃烧着的良知。后来成为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而牺牲的王申酉便是很典型的一例。一九六八年后，王申酉因卷入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和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很快“被隔离审讯，抄家”。不久，他又被送到江苏省大丰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接受改造”。就在这种流放生涯中，他与另外两个“反动学生”小黄与小薛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有机会还探讨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得不到他们所需的学习书籍，“王申酉和小黄，小薛悄悄拿走几百本学校图书馆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原准备看完以后悄悄送回。不料拿书事发，王申酉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毕业分配的权利”。〔22〕在常人看来，三个已被打成“反动学生”的青年竟为了学习马列而去偷书，无疑是疯狂之举。而对王申酉等人来说，“窃书”却是他们寻求真理之火必不可少的阶梯和某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义无反顾之举。

◇ 最后的几句话

自鲁迅写下他的《狂人日记》，成为旧礼教铁屋子里呐喊的“狂人”后，已经整整100年过去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沉睡的人们并没有醒来，铁屋子还没有被摧毁。相反，改朝换代以后的“新中国”的铁屋子远比“旧中国”的更为封闭和黑暗。

自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人在文革中发出他们在新中国铁屋子里的呐喊后，文革也已经过去50多年了。自改革开放发生后，“新中国”的铁屋子似乎被打开过一扇小窗，但是最近又被关上了。绝大多数沉睡的人们还是没有醒来……

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复，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百年前鲁迅和钱玄同对话的原点：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如果林昭、张志新和王申酉等先驱者们能活到今天，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在编完他们的遗作后，我坚信他们还是会抱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而杀生成仁、毅然献身。

但是，这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先驱者们的牺牲是否一定能唤醒铁屋子里“从昏睡入死灭”的“熟睡的人们”？或者：还要多少个百年才能毁坏这一“万难破毁的”铁屋子？

无论对那些思想先驱者，还是对本书的编者来说，都还是一个难以回答问题。

2018年8月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

注释：

- 1, 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选集·散文篇》,香港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12—13页。
- 2, 丁群:《陆兰秀狱中诗文》,美国成家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 3, 吴兆麟、田大业:《巾帼雄杰——记六十年代为反对造神运动而英勇献身的共青团员丁祖晓》,载《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244—246页。
- 4, 《二十一世纪》总3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
- 5,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8年,第90—91页。
- 6, 乌鲁木齐铁路局政治宣传部:《戈壁壮歌》,载《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年。
- 7, 均见本书的“张志新反文革文献三篇(1969年1月—1970年1月)”一章。
- 8, 王岚君、黄象滋:《吹尽狂沙始到金——记优秀青年吴晓飞的事迹》,载《划破夜幕的陨星》,第186—189页。
- 9, 均见本书的“陈尔晋的《特权论》(摘录)1974年—1976年初”一章。
- 10,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
- 11, 金凤、丁东编著:《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04—206页。
- 12, 刘济生:《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北京:《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
- 13,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第90—91页。
-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陆兰秀>
- 15, 林昭:《血书:“起诉书”跋语等(1965·07·05)》,载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3年第二版。
- 16, 见本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刑事判决书、1970年3月28日;(70)军刑字第29号”
- 17, 见本书中“大校蔡铁根蒙冤后的反思日记”一章。
- 18, 均见本书中“顾准读书笔记三篇”一章。
-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知青办文件《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981年10月。
- 20, 卢叔宁:《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 21, 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载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第10—17页。
- 22, 金凤:《血写的嘱托——一个时代的悲剧》,载《八载秦城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2—553页。

□ 原载《明镜月刊》2018年10月号。

~~~~~

## 【来龙去脉】

从“大有作为”到“很有必要”

• 秦 晖 •

◇ 两段“最高指示”的由来

1955年7月，毛泽东正在运筹“三大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环，即以全面加速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他在案头看到了一本《互助合作》的小册子——这是由当时的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到北京参加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时带去的经验材料。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廖鲁言看到其中一篇《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将其呈送给毛泽东阅览。所谓“一个乡”就是河南郟县的大李庄乡，此文写的其实是1954年的事，那年搞合作社缺少会计和记工员，乡里便动员在校读书的农村青年回来：“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社，其余的全部分配到7个‘社架子’去，以便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

毛泽东对此产生了兴趣，即兴挥毫写下了这段名言：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州日报》2008年12月26日，林霞虹、罗桦林：《麦田里守望逝去的青春》）

这就是后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被奉为两大“最高指示”之一的由来，这段话后来被浓缩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字。它最初所指的大李庄乡，在文革中隆重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据说是全国汉族地区人民公社中名字最长的。文革后知青宣传降温，人民公社也废除了，这里于是又恢复了“大李庄乡”的旧称。后来为了开发旅游，当地觉得当年的荣光可用，又改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乡”，简称“广天乡”。

1968年末，毛泽东在考虑文革中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善后问题。这时又有一篇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当年12月10日《甘肃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讲的是“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据说，“上山下乡工作开展以来，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看到此文后老人家“立刻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记者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查稿件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赵仕枢：《上山下乡狂潮是如何形成的》，《党史纵横》2004年第7期）

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发经记者增补的甘肃日报宏文，毛泽东亲自把标题中的“城里”加一字改为“城市里”，并在这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前加了“编者按”，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自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了领袖亲自发出的“动员”令，于是全国响应，举国动员，上山下乡从此前城里学生的选项之一，至此发展成为规模空前的“一片红”大潮。

几十年来，上述分别发表于1955和1968年的两段“最高指示”一直被当做知青运动的灵魂，家喻户晓，举世闻名。人们还常把两段话中最点睛的各四个字放在一起：“大有作为，很有必要”，以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在农村干革命的伟大意义。

◇ 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回顾这两段话所由来的两个事件：1955年的大李庄乡案例和1968年的会宁县案例，却发现两者存在极大的差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

在大李庄乡，回乡“大有作为”者是一些读过书的年轻人——“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可以说就是“知识青年”，但他们并不是城里人，甚至也不同于后来所说的“回乡知青”，因为他们同时也就是“贫下中农”——“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这其实很正常：1955年离“新区土改”结束才3年多（回乡故事实际发生的1954年离土改过去仅两年），那时的年轻人多是在土改前的“阶级”状态下成长的。而土改后出生的“贫下中农子女”到1968年也许已经“忘了本”而需要接受阶级的“再教育”了，但在1955年他们中最年长的也都还只是幼儿，连上学受教育的年龄都没到，更何谈毕业后接受“再教育”了。

换言之，大李庄乡案例的主角就是32位读过些书的青年农民。其实，1968年后在城市的职业中也一样，那时“读过些书的青年工人”也就是工人阶级了，没有人认为他们还需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但是读过些书的人去务农则不一样，他们就算务农到老似乎也还是“老知青”，表现再好也就是“先进知青”，没有人认为他们就是“贫下中农”。不过，在1955年还不是这样，那时青年农民如果土改时定了贫农或下中农成分（土改时虽已有雇农、贫农、中农，又分为下中农、上中农的划分，但“革命阶级”一般说的是“贫雇农”，“贫下中农”的说法是合作化时才兴起，到1960年代“四清”时才成为农村“革命阶级”的官方称谓的），读了书也还是贫下中农，《互助合作》这本小册子并没有称他们为知识青年。毛泽东的按语虽然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什么接受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之类的意识形态话题。

1954年，农村还处在“过渡时期”，农民本身正在经历从个体小农到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还是“改造”的初期。毛泽东这时的名言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不是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同时，当年中国人口中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十几，“一五计划”刚启动，工业建设正大规模起步，就业并不困难，城里人和“农村户口”间的户籍壁垒也尚未形成，至少尚未固化，城乡关系相对正常。那时的农民，尤其是读了点书的农民被招工进城的机会还不少。所以，近年来学界出现的关于发动知青运动两大动机——迫于就业困难的经济动机，还是改造知识青年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的意识形态动机——究竟哪个为主的争论，而这一争论用在大李庄乡是有点滑稽的。因为这两大动机在1955年都并不突出。大李庄乡那32名“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的回乡，既不是因为就业无门，也不是因为这些本身就是贫下中农的人还要接受什么“改造”，而就是为了新办合作社的记工员与会计需求。小册子对大李庄乡案例的介绍以及毛泽东的批示，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的。如果说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那也就是为了推进合作化而已。

而1968年的会宁县就不同了。首先，会宁县那篇文章的核心其实非常明显地就是为了解决城里人（“城镇居民”）就业无门的困境，这从《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醒目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人留在城里只能“吃闲饭”，成为“国家负担”，所以要动员他们下乡——这就是该文的核心逻辑。正如文章作者后来概括的，这篇文章讲的事就是：

“使职工家属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大庆家属之路，减轻国家负担，决定动员全区职工家属和闲散人员到当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也有种说法是干部下放劳动），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区（会宁县所属的定西地区）各县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动员安置。”（《人民政协

报》2012年8月9日，黄建祥、赵平：《“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当死狗”是谁说的？》）

所以，如果说大李庄乡案例与“安置就业还是意识形态改造之争”无关的话，那么会宁县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安置就业”的例证。

其次，会宁县与大李庄乡案例的故事主角身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如前所述，当年大李庄乡“回乡”的是读过些书的农民，而会宁县“下乡”的却是未必读过书的、包括文盲在内的“城镇居民”。大李庄乡回乡的32人都是青年，而会宁县下乡的“城镇居民”则有老有小，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据说就是讲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句名言的王秀兰，竟是个不识字的老太太。

据《会宁县志》：“时年54岁并身有残疾的王秀兰率全家于1968年7月到河畔公社落户，成为轰动全国的有名人物。……1979年2月王秀兰全家返回县城仍为居民，同年6月病故。”

而更详细的地方资料说：

王大娘名叫王秀兰，1915年生，会宁县五十铺河西坡（今甘沟乡）人。王秀兰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文化不识字，39岁丈夫去世后一直含辛茹苦的抚养几个孩子。……1965年王秀兰当选为会宁县城关镇枝阳巷居民组长，工作积极，吃苦耐劳，经常积极参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动。……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召开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动员会，她作为居民组长，首先响应号召，表示要带头下乡。当时50多岁的王秀兰在动员其儿媳下乡时说：“贫下中农在乡下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城市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这个动员会开罢不到10天，她就带领全家人到当时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队四百户生产队（现白草原乡一带）安家落户，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郭忠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档案界”网站）

近年来当地人写的另一篇资料，价值观已有所不同，但事实描述还是基本一致且更详细：

1968年，会宁县城的城镇居民下乡落户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影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带头下乡落户的城镇居民王秀兰，成了当时国人皆知的风云人物。

据记载，1915年出生的王秀兰，家居会宁县城，是一个纯朴老实的家庭妇女，文盲。1965年，她当选为会宁县城关镇枝阳巷居民组长，工作积极。

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革委会千方百计地动员城镇居民下乡到农村去。其主要做法有四种：一是“刮台风”与“清理阶级队伍”搅在一起，将一些列为批斗对象的居民强制到农村落户。二是采取硬逼硬赶的办法，对部分思想不通或有实际困难的居民，采取注销户口，停止粮油供应，停职停学，强行拆房等行为，逼迫其离城。三是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思想上“动员”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四是树“典型”。由此，县革委会的人想到了王秀兰。屈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压力，王秀兰违心地报名下乡，来到会宁白草原四百户村落户。同时和王秀兰一起报名的还有王庆一等4户居民。其中，王庆一是普通工人，他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何必在城里‘拉死狗’”。“拉死狗”是会宁县城人常说的话，意思是“无所事事”。



1968年6月26日，会宁县城关镇革委会将7名“刮台风”的批斗对象及家属第一批强制下放到农村，随后动员城镇居民下乡掀起高潮。县革委会为此还成立了会宁县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号召全县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向王秀兰等5户居民学习，“到农村去，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截止当年12月上旬，全县已有178户932人分别下放到13个农村公社去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任重，会宁籍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会宁纪事（三）：光阴好比打墙的板——我们也有两只手》）

撇开王秀兰的豪言壮语是否“违心”不论，这里讲的事实与主流资料一致：当时会宁县动员下乡的对象是“城镇居民”，树的5个典型，第一个就是这位“王大娘”，其他几位现在也可以查到：一位就是上文提到的王庆一，他据说是“普通工人”，因工厂在文革中停产而赋闲（失业）。还有“高中毕业知识青年王永强和只有14岁的女青年罗兰芳，未提及学历，按其年龄顶多是小学生。最后是高玉兰，“她虽然下乡才几个月时间，但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已被社员们评为标兵”。但如今可查的所有的报道都没有提到她的学历，也没有说她是“知识青年”（如王永强那种），而按当时的形势，即便甘肃日报初次报道忘了说，人民日报发表修改版时已经定调宣传知青下乡并且要求增补材料，她如果是知青就绝不可能忽略这一身份，所以在无法查阅原始档案前我只能估计她也是一般家庭妇女。

显然，五个典型中只有一个是知青，最出名的一号典型文盲老大娘王秀兰则“知识”（指学历身份）与“青年”都无从谈起。所以，当时甘肃定西搞的这场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知青运动”，而只是一场强制压缩城镇人口的运动。当时甘肃定西会宁省地县三级，运动搞得雷厉风行。据说定西地区搞得最厉害的靖远县已经赶走了50%的城市（应为城镇）居民，会宁次之，40%的城里人被送往农村，“下去的人虽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较扎实。”这么做的动机其实就是为了压缩“吃闲饭”者，“减轻国家负担”。不但根本没有提到学生的思想改造与结合工农等等，也完全没有“缩小城乡差别”之意——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掌权的定西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力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就“性格直爽”地说：“定西是个穷地方，城市和农村差别不大，城里住的，大部分也是农民，下与不下区别不大。”

#### ◇ 两个典型都没成为“知青模范”

总之，1968年的会宁县与1954年的大李庄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李庄乡回乡的就是“贫下中农”而不是他们的子女，当然更不是城里学生。而会宁县“下去”的全是城里人。大李庄乡回乡者并不是出于就业压力，而会宁县这个压力当时似乎非常严重。

然而这两个典型，却也有两个一致的地方：第一，都不是一场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运动，第二，都不符合“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主题。

大李庄乡故事的主角不是城里人，会宁县故事的主角不是学生，他们都与毛泽东为会宁那篇文章发出的“12·22指示”（又称12·21指示，因为这一“最新最高指示”是21日晚广播发表，22日见报的）所说的“城里干部和其他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不是一回事。而且，大李庄乡的主角虽然读过书，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或知识分子，但他们同时自己也是贫下中农，谈得上接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

而会宁县的王秀兰老大娘不仅不是“知识青年”，自己在“旧社会”也是“苦大仇深”的贫寒人家，她还用得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且不说她并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又何来“再”乎！另一个典型王庆一本身就是个“普通工人”，工厂垮了被“精简”

下乡在当时也算是惯例，但工人阶级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能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上吗？

无怪乎这两个典型虽然在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脍炙人口，毛泽东为这两件事分别发出的两段“最高指示”更是被奉若神明。但是，两个典型的当事人后来都没有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模范”。大李庄乡后来最出名的知青模范薛喜梅，是1968年才来这里插队的郑州市“下乡知青”，而会宁县当时五个典型中唯一的知青王永强后来籍籍无名，整个会宁县后来也没有出过具有全国影响的“知青模范”。

当然，这不是说那些主角们后来没有当先进、模范的，但他们都是以别的身份，而不是以“知青”身份出名。会宁县的王大娘后来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见过毛主席，却没有在各级“知青积代会”上露面。而大李庄乡当年回乡的32人，后来出了好几位基层干部，有的如黄发娃、邱振甲等还当过劳模和人大代表，但他们也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作为“老支书”、“老村长”而不是作为“先进知青”获得这些肯定的。作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青的头面人物，是后来来此插队的那些城里学生，而不是他们。（本文刊发时删去注释若干）

□ 原载：经济观察报

~~~~~  
【追根溯源】

中国暴民政治的历史渊源

• 许成钢 •

文化革命是一场恐怖政治的群众运动，产生于极权制，有着深厚的极权主义历史渊源。一方面，其渊源包含大量的外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的暴民政治，也是其产生的土壤，例如近代的义和团暴乱。虽然大跃进改变了中国极权制的经济和行政的操作，但极权主义本身，从基本思想到基本制度都是外来的。文革中爆发的宗教式的狂热，暴民的宗教狂式的迫害，是极权主义的果实，是外来影响和历史成分交互催化的结果。

◇ 极权主义的宗教狂和大迫害

极权主义与宗教式狂热是密不可分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宗教式的狂热。遍及全中国的宗教狂是随极权主义一道而来的舶来物。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其建党模式深受若干沙俄时期的重要制度成分的影响，包括东正教会以及历史悠久、从事暴力活动的政治秘密组织（列宁的哥哥即为秘密组织“人民意志党”的地方领袖，负责策划刺杀沙皇的行动——作者注）。

东正教会比俄国历史更长久，影响力穿透俄国的整个社会。东正教教会类型的宗教式统治，教会式制度，及煽动宗教式狂热的手段，是列宁主义党的基本制度渊源之一。

东正教会跟罗马教会的制度上，性质相同。当然，他们对基督教的解释有差异，有权力斗争，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双方都把对方作为异教徒绞杀。布尔什维克中的东正教会和政治秘密组织这些制度成分，使得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原则，与过去第一和第二共产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完全不同。这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

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作为敌人消灭。而中共的起源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的国际部）在中国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中世纪的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其共同的基本特点是以救世主代表人的名义，煽动信众的宗教狂热，同时迫害异教徒。他们不仅迫害教会外的异教徒，也对教会内的成员实施迫害，包括很高层的成员。任何人，只要与上级持不同的看法，对经典的解释和教会上层不一样，就会被认定为异教徒，遭到严厉的惩罚。惩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教廷即自己的法庭对异教徒判处极刑，另一种就是利用信众，即暴民，实施迫害。

中世纪，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的信众普遍不识字，普通信众没能力，也不允许阅读《圣经》。《圣经》必须由专职的神职人员讲给信众听。只有神职人员才知道什么叫做主义，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主义是唯一的，而神职人员必须逐级执行上级直至教宗制定的中央方针大策。教宗定义的主义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偏离教廷对宗教的解释，教廷就要煽动信众，对其进行残酷的惩罚。历史上，无数的异教徒被信众暴民以焚烧的方式处以极刑。

◇ 源于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理论基础

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外，文革中最频繁被提及，直接被红卫兵、造反派模仿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俱乐部发明的“红色恐怖”。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列宁主义党，都极具重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之一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于法国，比法国大革命稍早一点。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推广了这种思想和这类社会实验，共产主义引起很多人的广泛注意，其中就包括马克思。另一个对列宁主义党和文化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

卢梭发明了一整套的理论，强调集体意志，强调个人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利益，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卢梭看上去在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实际上他影响最大的理论是集体意志决定个人行为。马克思和列宁都大量学习了他的这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绝大部分理论论述，都基于卢梭的理论。

卢梭的集体意志论是迈向极权主义的第一步，比理论更重要的是基于其理论的实践和执行。对卢梭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称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极端激进组织，其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学生。罗伯斯庇尔在集体意志论的基础上，发明了“红色恐怖”的概念和制度。

他首创在革命组织内，以集体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系统地施行恐怖统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用恐怖的方式清除异己，并以此统治党组织的理念、政策和制度。被清洗的革命同志一个个被送上断头台。当所有革命党同志最终意识到，罗伯斯庇尔对所有人的威胁、对革命的威胁时，他的同志们则集体决定，判处罗伯斯庇尔死刑，并将其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法国大革命失败，但是法国革命产生的雅各宾俱乐部式的组织，通过列宁主义的传播，在全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系统地使用“红色恐怖”的概念、做法、机制和手段。第二共产国际的领袖卢森堡和考斯基等都曾指出，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系统地重现了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俱乐部。

文化革命中，一度最流行的最高指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就是这个精神的表现。在这一最高指示的指引和蛊惑下，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堂

而皇之地高喊“红色恐怖”的口号，系统地实施“红色恐怖”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做法、机制和手段，并且将其发展到更大的规模，更深的残暴。

在文化革命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狂热时期，巴黎公社被神话成将要创造的新社会的榜样。1967年初，在毛泽东和他的主要追随者的直接支持下，上海造反派在全国率先推翻了中共上海党政政权。当年2月5日，百万人见证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试图由此在全国推广这种模仿巴黎公社的、全新的政权，取代老式极权主义制度的党政政权。模仿巴黎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扩大版。

无论上海人民公社还是农村人民公社，其统治模式，都是部分学自巴黎公社，另一部分来自布尔什维克。在公社里，由“革命群众”组成的统治委员会（例如称为革命委员会）决定要镇压的对象。

巴黎公社只短暂生存了两个月，其在法国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巴黎公社的重大价值在于它启发了马克思，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即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发生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是他在巴黎公社时期为媒体撰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专栏文章的文集。书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自巴黎公社的实践，是对巴黎公社的创造的总结。

马克思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学习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批评巴黎公社，认为他们使用暴力不够，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讲民主，浪费了时间，没有用暴力把敌人消灭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等，这些来源于巴黎公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成分，是文化革命的理论基础。

◇ 源于中国历史的暴民运动

仅只是外来的暴力理论和影响，不足以在中国产生如文化革命这样广泛和残暴的暴力运动。原本就深深扎根中国历史的暴民政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总结中国历史时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没有革命。因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暴力造反，其目的都不是改变社会，而是改变皇帝。要么为的是打倒在位的皇帝，自己做皇帝；要么图的是被皇帝招安，然后升官发财。在后者，暴行针对的是所有皇帝的敌人，甚至包括外国人。

在两千多年的各色造反的历史中，充满了暴民政治的传统。其中，对文革中影响巨大的暴民政治运动之一，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期的义和团。在短短几年里，义和团屠杀了240多位外国传教士，两万多名中国基督徒，烧毁教堂无数；与清军联合，杀戮外国驻华使节，攻击其驻华使领馆。当年义和团的宣传说，“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并江山。”充分显示义和团暴民的极端种族歧视，极端仇视外来宗教，和极其残酷、残暴的本质。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义和团之类的暴民造反就已经被添加上了马列主义的血统，当作反帝的革命传统，是中共革命的先驱。例如，周恩来在1955年对来访的东德总理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文革期间，义和团更是被大张旗鼓地鼓吹为反帝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批评电影《清宫秘史》，在其发表在中共党刊《红旗》（1967年3月30日）

的文章说，“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实际上，当时所谓批判《清宫秘史》的运动，变成了鼓吹义和团暴力的工具。义和团这个历史榜样极大地推动了暴民政治的兴起、扩张和覆盖范围。许多学校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从穿衣到口号，模仿义和团的“红灯照”，在学校和社会施暴。在义和团全面排外暴行的示范和鼓舞下，外交部的造反派采取了与义和团相似的暴行：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即使馆），殴打并威胁英国驻华外交官。

但是，文化革命的暴民政治与义和团的传统暴乱有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革命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极权主义制度下长期系统培育的，并且由领袖择机煽动起来的。

比义和团更直接、更有力的榜样，是毛泽东曾经亲自领导的湖南农民暴动。农民暴动的基本特点是针对有产阶级施行暴行和恐怖政治，以暴力剥夺财产，以恐怖的方式进行打击和统治。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刚刚兴起时，范围只局限于校园，方式只限于大字报和批判会。

江青、康生等文革小组领导们，在公开集会上引用毛泽东30年代发动农民暴动的言词：“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一方面煽动“革命小将”的情绪，另一方面以实例，教授施行暴力的方法。告诉红卫兵、造反派们，能使用暴力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的进步，离不开对文革的反思。认识文革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是保护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防止文革复发的前提。

□ 来源：FT 中文网 2018年10月9日

~~~~~

## 【亡灵祭坛】

被镇压的父子：邓鸿芹、邓思京

• 孙 隲 •

近期，看书时看到太原市教育干部教师邓思京因在文革中两次进京反映情况而被杀的事情后，笔者遂想多了解一下这位英雄的事迹，查阅了一些材料后，得知其父邓鸿芹老先生是广东龙川人，在粤北地区很有影响，抗战时曾任过国民党龙川、兴宁县长，并倾向“进步”，但在镇反运动中被政府镇压。父子两人先后殒命，又几乎同时平反，这在历史中也不多见。以下是笔者根据查询到的材料，将此父子两人的经历略叙一二：

邓鸿芹（1894—1952），广东龙川人，广东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大革命期间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曾任龙川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之后，从事教育事业，1926年至1934年，分别在广东的龙川一中、防城中学、惠州崇雅中学、番禺师范学校，任教员、教务主任、校长。1935年至1937分别任广东省教育厅及三水县教育科科长，龙川县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等职。1938年至1947年，分别任国民党政府龙川县、兴宁县县

长。期间，抗日军兴，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邓鸿芹支持两党的抗日政策，尤其支持民众抗日救亡团体，曾任龙川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长，拨款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龙川日报》和举办“龙川青年自我教育训练班”等。1948年辞去兴宁县长职务，到广州珠海中学任教至1949年6月。

1949年7月，邓鸿芹到香港，参加中共华南分局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展对广东国民党当局“策反”工作，邓鸿芹的具体工作是协助罗梓材策反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邓还写密信策反连平县长起义投诚，又通过广州某警察分局局长杨增樵与其同乡、师生、旧部之谊，策动广东警察学校教育长廖献周，率广州警察起义。

国民党撤离广州前，邓鸿芹等一批民主人士回到广州，后参加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领导下的各种活动，1950年2月省委统战部、教育厅分配他接管私立广州文化大学，邓鸿芹任总务长。1951年4月邓鸿芹由广东省公安厅逮捕，1952年3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处决。1980年经龙川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研究，认定邓鸿芹属策反人员，龙川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对邓鸿芹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邓思京生于1937年，据有资料说，因出生这一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首府南京被日寇攻陷，邓鸿芹遂给儿子起名“思京”，以示不忘国耻，思念南京。邓思京的童年生活不清楚，以后随着父母生活在广州，父亲被镇压后也没有离开广州，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入读武大的时间应该是1956或者1957年，资料上说，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提意见而被开除了团籍。1961年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到广州而是被分配到山西工作，后调入太原市教育干部学校任教。

文革开始后，面对社会的动乱和癫狂的革命热情，邓思京开始思索，是什么使中国动荡？是谁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邓思京认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事，决不能保持沉默，他决定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写成材料，送到北京。他写好了几万字的材料，于1967年7月和9月两次进京，最后一次他直接来到中南海，想见最高领袖，被闻讯赶来的专政人员抓走。

邓思京所写的材料，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林彪等人的反对，在材料中他写道：

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阴魂在社会主义国土上横行，一股反动逆流要把人民革命的洪流覆盖，一伙居心险恶的敌人妄图颠覆我国的红色政权，一幅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图影摆在我们面前……一小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伪装革命的面孔，上抗毛主席，下压人民群众，他们结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

可以看到，邓思京受时代的影响，其话语中也充满了文革的气息，但他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如日中天的副统帅和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组，其胆识令人敬佩。在以后的审问中，他一直坚持反对林彪，也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在北京关押了一年之后，1968年9月被押回了山西，关进了监狱。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邓思京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列在被镇压名单中，1970年4月27日，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书写反动诗词，为被打倒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鸣冤叫屈”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九年后，太原市中级法院撤销了1970年的原判，宣布邓思京无罪。

邓思京的事迹，基本上都来源于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书籍，当时是初步反思文革的时期，所披露出来的内容也多是反对林彪等人罪行的内容，至于他的材料中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内容和思考，笔者无法得知。

邓鸿芹老先生被镇压时，邓思京年方十五，少年的他是什么感受，他是否能体会到父亲的无奈和绝望，不得而知，十八年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失去了生命，行刑前他在想什么，他会想起他的父亲吗？

枪声响起，父子相聚，泪……

□ 来源：《纪念邓鸿芹老师》（张克明）；《龙川县志·人物篇·邓鸿芹》（2012年出版）；《划破夜幕的陨星》（1981年出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